

文章编号:1002-980X(2007)08-0052-04

演化模式、临界因素与我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判定

肖洪武

(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 杭州 310006)

摘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从公平和效率的性质界定入手,提出从历史的角度看,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波浪式演化的对立统一关系,并对决定和制约这一演化规律的临界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公平和效率关系进行了总体界定,认为我国已进入了公平和效率的正相关区间,必须进一步加大公平调节的力度。

关键词:波浪式演化;临界因素;公平;效率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1 公平和效率的性质界定

公平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的复合体系,包含有伦理公平、经济公平、社会公平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出的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效率的原意是指劳动效果与劳动量或工作效果与工作量的比率,从经济意义上看,它描述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产量或劳务产出与资源投入的对比关系^[1]。

在收入分配领域中,公平主要是指社会成员间在收入和分配上的均等化,而效率则主要指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

从性质上讲,公平和效率都具有着双重的涵义,即都是既具有经济涵义,又具有社会涵义。对于公平而言,其经济涵义主要指的是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而其社会涵义则主要指的是伦理公平和结果公平;同样,对于效率而言,也不仅包含着经济效率,在社会运作层面也同样有其效率要求。

虽然公平和效率都具有着双重的属性,即都同时作用于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但其主要作用领域又有所不同,公平主要作用于社会领域,体现的是一种政治法权关系;而效率则主要作用于经济领域,体现为一种经济关系。

2 公平和效率的演化关系判定

1)从总体上而言,公平和效率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而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又存在着一定的临

界面。根据公平和效率的性质界定,公平主要作用于社会领域而效率则主要作用于经济领域,因为这两大领域的运作规则不同,所追求的目标也存在着一定的对立性,因此公平和效率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立性,具体而言,这种对立性表现在:政治法权的公平可能对经济效率的增进形成伦理界限和社会制约,从而影响到效率提高的程度和空间。

经济效率的提高又会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禀赋差异,使财富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集中,从而产生一种贫富分化的推动力,阻碍社会公平的实现。

另外一方面,公平和效率间又存在着统一面,这是由两者的双重属性决定的:首先,它们都同时作用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当它们共同作用于同一个领域时,就会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即经济效率会推动经济公平的实现,经济公平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社会运作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而社会公平反过来又能够推动社会运作效率的提高。其次,即使在不同的层面上,两者的对立性也是有限度的,当超过这一限度时,又会出现向统一性的转化。如牺牲社会公平可能推动效率提高,但过度的损害社会公平又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带来效率损失;同时,弱化效率追求也可能减轻贫富分化的推动力,但过度的弱化又会造成“共同贫穷”,最终损害到社会公平。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公平和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其中存在着一定的临界面,无论是两者间的对立性还是统一性,

收稿日期:2007-03-31

作者简介:肖洪武(1974-),男,湖南隆回人,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人口与经济、科技政策与管理。

只要达到这一临界,就会“物极必反”,产生向反方向的转化。

2)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公平和效率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波浪式演化的。这一点可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得到证明,在原始社会初期,公平和效率是统一的,这时候的集体公社制有利于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开始出现向对立面的转化,顺应这一要求,出现了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的转变;而奴隶制中过度的不平等又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公平和效率间的统一性,这时出现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奴隶变成了佃农,整个社会的公平程度又有所提高;即便在封建社会内部,公平和效率间的这种波浪式演化规律依然存在,当社会不平等达到一定界限,公平和效率就会变为正相关,这时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都会相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但随着新王朝的稳定,公平和效率的对立面又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时的土地兼并、贫富分化都是牺牲公平促进效率的明证。到了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主要是对立的,这时出现了所谓的圈地运动和资本原始积累;而当这种对立性发展到一定限度,效率的进一步增进又会要求公平程度的相对提高,这时公平和效率开始变为统一体,顺应这一要求,出现了所谓的西方“福利国家”;但当前福利国家的困境实际上又说明公平又重新成为了效率增进的制约,两者关系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向对立面的转化。

从这一演变关系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公平和效率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波浪式演化的,一旦其对立性或统一性达到某一临界面,就会出现反方向的变化,因此牺牲公平并不必然有效率的提高,而提高公平也不必然具有促进效率的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临界面的转化。

3 公平和效率波浪式对立统一关系的临界因素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公平和效率间的关系是波浪式对立统一的,但这种关系的演化必须要以达到临界面为前提,在现实中,构成这一临界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正是因为这些临界因素本身所具有的波浪式变动趋势,共同构造了公平和效率间的这种关系演化规律,具体而言,这些临界因素包括:

3.1 社会成本因素

效率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目标,往往具有较

强的刚性特征,而公平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相对又具有更强的弹性特征,因此社会往往通过公平程度的调整来达致效率增进的目标,但公平程度的调整需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这里不仅包括维系社会稳定的成本,还有维系对劳动者的有效激励方面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而且这种社会成本是随着公平程度的降低而逐步加大的。当公平和效率对立时,社会可以通过牺牲公平来获取效率的提高,但这时的社会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当社会成本的支出超过它所能带来的收益时,总的效率增进就会变为负值,这时为了维持效率的进一步增进,公平和效率又会向统一的关系转化,这时适当提高公平程度,降低社会成本成为促进效率提高的必然要求。但是当社会成本降到远低于其所能带来的收益时,因为获利空间的存在,相对扩大收入差距又能够推动总的效率增进,这时候公平和效率又会重新变为对立关系。

可见,社会成本因素的制约对于公平和效率间对立统一关系的波浪式演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它构成了公平和效率关系演化的重要临界因素。

3.2 需求拉动因素

按照库兹涅茨的倒U模型,经济增长是储蓄和积累的函数,收入差距的扩大可以使储蓄集中并加速积累,从而使投资的规模扩大。可见收入差距的扩大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投资需求的;但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相应的压缩消费需求,根据西斯蒙第的理论,富人的大部分收入是用于储蓄,而穷人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财富过于向高收入者倾斜,从而使总消费需求不足,并最终造成生产过剩的局面。同理,当收入差距缩小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刺激消费需求,但又会通过妨碍资本形成最终制约社会的投资需求。

公平调整的这两种需求影响效果也是波浪性变动的,当收入差距扩大时,投资需求会相应增加,但受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和供求平衡的制约,这种投资需求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因为效用的降低而增长乏力;与此同时,全社会的消费需求却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受到了强烈的挤压,其边际效用是逐渐上升的。此消彼长,当收入差距扩大的投资拉动效果逐渐低于其消费压缩效果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会产生拉动消费的强烈需求,这时的公平和效率就会变成统一关系,只有相对提高公平程度才能进一步推动效率增进。同样,当这种公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其消费需求的拉动效果又会逐渐减弱,

而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需求又会日益迫切,这时公平和效率又会重新成为对立关系,必须牺牲公平才可能换取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需求拉动效果的这种波动形式作用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便会影响公平和效率的相互关系,使两者间的对立统一呈现出波浪式变化的特点。

3.3 要素投入因素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需要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共同投入,前者主要按其复杂熟练程度及其对价值的贡献率参与分配,而后者则主要依其稀缺程度及其对价值的贡献率参与分配,效率的增进需要这两方面要素的共同作用,但在现实中,这两种要素的投入也要受到收入分配程度的影响,并呈现出波浪式变化的特点。

当整个社会的收入分化程度逐步降低时,一方面会通过全体居民的收入提高推动教育的发展,从而增加一般性人力资本的投资;另一方面又会通过对资本形成的制约相对减少实物资本要素的投入。由于受边际投入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当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生产发展对于实物资本的要求就会增加,于是公平和效率会逐渐向对立面转化,必须通过对公平的牺牲来获得实物资本的形成和投入。同样,当全社会的收入分化程度逐渐提高时,又会制约人力资本的投入,当这种作用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促使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向统一面转化,要求公平程度的逐步提高。除此之外,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内部也有高层次人力资本投资和一般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区分,当收入分化程度降低时,会促进一般性的人力资本投资,但会相对压缩一些较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投资。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这种效果持续到一定程度也会产生公平和效率向对立面的转化,但公平和效率的对立又会造成社会收入分化程度逐渐提高,这时候虽然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有所增加,但一般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却会相应出现萎缩状态,当这种效果持续到一定程度又会出现公平和效率向统一面的转化。

可见在要素投入领域,同样存在着波浪式变动的色彩,而这一色彩对于公平和效率间波浪式对立统一关系的形成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

3.4 交易成本因素

这里主要涉及到的就是集团间博弈成本和集团内博弈成本。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取决于穷人集团和富人集团间的博弈,而博弈的结果又与两大集团内达成集体行动的成本有关。当整

个社会的收入分化程度逐渐降低时,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穷人集团内部显得越来越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其采取集体行动的博弈成本也不断增高,而富人集团则因为利益的损害而越来越趋向于采取统一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财富会重新出现向富人集团的倾斜,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又会向对立面转化,社会的公平程度也逐步降低,但公平程度的降低又会造成收入分化程度的上升,并使得穷人集团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越来越低,特别是当穷人集团采取集体行动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时,两大集团间的谈判就不会再依赖于市场规则,而变成游离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强取,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明证。这时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公平和效率又会变成统一关系,只有通过公平程度的相对提高才能推动效率的平稳增进。

可见穷人集团和富人集团间博弈成本的变化也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演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构成了公平和效率间波浪式对立统一关系的临界因素。

3.5 收入替代因素

社会收入分化程度的变化对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同时具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方面的作用,而这两方面的效应也具有波浪式演化的特点。

当全社会的收入分化程度逐渐降低时,一方面会产生刺激国民财富增长的收入效应,因为这时社会公平程度的相对提高将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扩大社会的消费需求,并且还能够在相对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但另一方面,收入分化程度的降低又会带来阻碍效率增进的替代效应,因为它不仅会使高收入者的边际收入下降,从而使他们更愿意选择闲暇而非工作,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低收入者对于福利制度的依赖,从而间接损害劳动生产率,使国民收入下降。这两种效应虽然同时存在,但其变化趋势却不同,随着收入分化程度的继续降低,其收入效应的增长速度是越来越慢的,而其替代效应的增长速度却在不断上升,当替代效应超过收入效应时,公平和效率就会变成一对替代品,这时候国民财富进一步增长的要求又会迫使社会降低其公平程度;但社会收入分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会使得公平和效率间的替代效应逐步降低,另一方面又会造成公平的收入效应增加,当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又会重新要求公平程度的提高,即公平和效率又重新变成了一对互补品,统一面在两者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正因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间这种波浪式变动

的规律,才使得公平和效率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呈现出波浪式演化的特点。

4 对我国现阶段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整体判定

根据对造成公平和效率波浪式对立统一关系的临界因素分析,再联系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不难得出,在我国现阶段公平和效率间正在经历由以往的对立关系向统一关系的转化,而我国也逐步进入了公平和效率的正相关区间,其主要表现是:

4.1 社会成本因素的变化

一般而言,基尼系数低于 0.3 属于收入分配过均等,在 0.3~0.4 之间属于收入分配正常差异状态,高于 0.4 属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超过 0.45 则反映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极易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的局面。而根据统计,我国城乡居民合计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超过 0.5,可见我国的收入分化程度已逐步进入极度不平等区间,效率增进的社会成本也在急剧增加,而当前阶段社会各界对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视更是直接证明了这一点^[21]。可见在社会成本因素上,我国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公平和效率波浪式演化关系的临界区间,公平和效率关系的统一性转化决定了我国应相对提高全社会的公平程度。

4.2 需求拉动因素的变化

从现状看,目前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几乎全是以前存贷的形式出现的^[3],消费需求的拉动因素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另外一方面,因为产权信用制度的混乱以及经济预期的低下,投资需求的增长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需求拉动因素要求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重新走向统一,要求通过公平程度的提高来拉动消费需求。

4.3 要素投入因素的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改革主要走的是一条资本密集型的道路,实物资本要素的投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由于受到边际投入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单纯的实物资本投入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需要,而且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人力资本的因素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技术升级的要求和国际竞争的需要都要求我国改变生产中的要素投入方式,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4]。这就说明,在要素投入因素上,我国也已经步入了公平和效率波浪式对立统一关系的临界区间,提高公

平程度,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4.4 交易成本因素的变化

在集团间和集团内的博弈成本方面,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穷人集团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已越来越低,低收入阶层要求提高社会公平程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一现象表明,在交易成本的因素上,我国现阶段的公平和效率关系也已经开始向统一面转化,因此要维持社会稳定,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扶持力度,相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平程度。

4.5 收入替代因素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当时公平和效率间的替代效应较大而收入效应相对较小的状况,我国采取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平调整对于效率增进的替代效应已越来越小,而其收入效应却在逐步增加,我国当前内需不足的状况更说明,现阶段公平调整的收入效应已日益超过其相应的替代效应,只有相对提高社会的公平程度才可能通过收入效应的发挥而进一步推动效率的增进。实际上,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转变为“在初次分配领域中更注重效率,在再分配领域中更注重公平”,加入更多的公平调节色彩,正是这一临界因素变动的必然要求。

综合对以上各种临界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的一致结论就是在我国现阶段,公平和效率间波浪式对立统一关系已经进入其临界面,即正在完成由对立面面向统一面的转化,顺应这一要求,我国现阶段应加大公平调整的力度,通过再分配领域的公平调节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魏凤春.收入分化、制度僵滞和外来的挑战[J].财经研究,2002(12):7-10.
- [2]姚德全.公平与效率关系重新审视及经济发展战略调整[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3):7-11.
- [3]马从辉.论收入分配原则中的效率与公平[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2(2):36-41.
- [4]文魁,宋谦.收入分配格局的整体判断与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2(3):20-23,28.

(下转第 110 页)

Central Bank Plays in " Prisoners' Dilemma"

GAO He¹, QIAN Hui-feng²

(1. 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8, China; 2.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Shanghai 200335, China)

Abstract : Recently, China's fast increase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and being the number one of the amount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have been the focus and its potential huge risk and cost have caused the world wide attention. The thesis analyses the curr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our country'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from the angle of one of the potential risks---the high amount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will weaken the independence of central bank's monetary policy. The first part mainly describes the current phenomen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fast increase and explains the reasons. In the second part, it analy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igh amount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and the central bank's monetary policy, which has the potential huge risk. The last part puts forward the resolutions to the possible existing risk.

Key words :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RMB counterpart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monetary policy

(上接第 16 页)

而通过不同团队的合作使得员工的知识、技能得以增长,并通过再次的团队合作转化为团队的、组织的知识,从而使组织竞争力得以提升。因而促进员工的学习、成长也是组织结构设计的的重要内容。

5)文化导向。组织文化在知识经济时代跃升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促进开放、合作、创新文化的建设,也是组织结构设计的的重要原则。

总之,我国企业应适时地调整、再设计组织结构,以迎接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参考文献

- [1] PETER F DRUCKER. The Coming of the New Organiza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88, 66(1): 45 - 53.
- [2] IKUJRO NONAKA.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1(6).
- [3] NONAKA. L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4, 5(1): 14 - 37.
- [4] ROBBINS. Management [M]. 7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Inc. 1999, 256
- [5] PETER F DRUCKER. The Discipline of Innova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76(6): 149 - 155, 96 - 104.
- [6] JOHAN WIKLUND, DEAN SHEPHERD. Research Notes and Commentaries: Knowledge - based Resource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Business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13): 1307 - 1314.
- [7] A D CHANDLER JR. 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y Enterprise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2.
- [8] 杨瑞龙, 周业安. 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 [9] ISAKSEN S G, LAUER K J. The Climate for Creative and Change in Teams [J].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2, 11(1): 74 - 86.
- [10] SANDSTROM E, MEUSE K P, FUTRELL D. Work teams: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J]. American Psychologists, 1990, 45: 120 - 133.

Organization Structure Selection under Knowledge Economy Orientation

JI Xiao-fen^{1,2}, BAO Gong-min¹

(1.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College of Fash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 By analysing characteristic of knowledge economy era and comparing advantage and weakness between different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ccording to companies practice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to design and select organization structure under knowledge economy orientation for our country companies.

Key words : knowledge economy; organization structure design; knowledge sharing

(上接第 55 页)

Evolution Mode, Critical Factors and Relation Diagnosis between Equity and Efficiency in China

XIAO Hong-wu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0006, China)

Abstract : Dispos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equity and efficiency correctly has become the basic found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roperty delimitation of equity and efficiency,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at there is a relation of unity and opposition which evolve in wavelike evolution between them, and make a deep analysis on the critical factors which decide and restrict it. On the base of it, this paper make a judgment on the relation of equity and efficiency of our country,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the equity and efficiency in china, so we must reinforce the extent of accommodation towards equity.

Key words : wavelike evolution; critical factors; equity; efficiency